

制度·目标·行为

中国国有企业
发展战略研究

孙稳进 张 旭 编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9.241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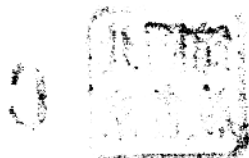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中国国有企业现状分析	(1)
第一节 国有企业生产与管理的现状.....	(2)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行为分析.....	(6)
第三节 国有企业规模经济的现实状况	(12)
第四节 现阶段国有企业运营的基本特征	(19)
第五节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对策选择	(21)
第二章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与重塑	(28)
第一节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目标与内涵	(28)
第二节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面临的难题	(39)
第三节 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新思路	(47)
第四节 外国专家纵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54)
第三章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61)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	(61)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企业机理选择	(70)
第三节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配套与协调	(73)
第四节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微观基础重塑	(75)
第五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途径与步骤	(78)
第四章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	(84)
第一节 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	(85)
第二节 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式及方法	(87)
第三节 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	(92)
第四节 企业技术创新的机遇与随机策划.....	(100)
第五节 日本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简介与启示.....	(106)



C

175569

第五章 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114)
第一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114)
第二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处理好 四方面的关系.....	(123)
第三节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企业自主性原则.....	(128)
第四节 开放企业产权交易市场.....	(134)
第五节 企业产权转让价格的形成基础.....	(144)
第六章 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152)
第一节 股份制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152)
第二节 股份制在国有企业的实现与突破.....	(159)
第三节 特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股份 制改革实践.....	(164)
第四节 发达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公司管理体制.....	(173)
第七章 国有企业跨国经营发展战略	(178)
第一节 国有企业跨国经营的环境分析.....	(178)
第二节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战略.....	(183)
第三节 企业跨国经营与现代信息技术.....	(195)
第四节 运用知识产权,拓展国际市场.....	(200)
第八章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207)
第一节 五国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国际比较.....	(207)
第二节 英国国有企业的改造.....	(218)
第三节 奥地利国有企业的改革经验.....	(224)
第九章 中外合资企业经营管理的宏观启示	(228)
第一节 中外合资企业经营管理的现状.....	(229)
第二节 中外合资企业的转移定价现象.....	(234)
第三节 中外合资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	(244)
第四节 “复关”对中外合资企业的影响.....	(253)



第一章 中国国有企业现状分析

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保持高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热点问题和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同时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滞后环节。在我国,1987年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一直未能推出切实可行的完善措施,未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有新的实质性进展。1992年7月,在国有企业再次普遍“吃紧”的情形下,国务院颁布了旨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一年多来,从中央、国务院、到企业界、舆论界,都在敦促、呼吁尽快落实此《条例》。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界,一些学者开始对以往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进行全面反思,更有一些学者把思维的触角延伸到了国有的所有制理论,开始对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思考。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十几年来,争取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经营方式等措施,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矛盾,着力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中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指导思想,向人们透射出了国有企业的希望之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进行解放思想,需要进一步“换脑筋”,这就是目前的国有企业现状向我们提出的客观要求。

第一节 国有企业生产与管理的现状

经济改革以来,我国企业生产管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和改革前相比,我国企业管理已经由单纯的生产型管理开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管理。

第一,企业的经营管理意识逐步增强。企业不仅增强了管理意识,而且形成和增强了经营意识。一是有了市场观念,企业已经开始面向市场,研究市场,开拓和占有市场。二是有了竞争观念。过去曾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范畴,现在不仅理论上肯定了竞争,而且实践中存在着竞争。由于有了竞争观念,质量观念、成本观念、时间观念、服务观念都增强了。三是有了利润观念。过去惧怕言“利”,现在利润观念已经贯串到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之中。由此,设备观念也增强了。四是有了人才和科技观念。企业普遍认识到,产品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从而把人才的培养使用和科学技术的开发研究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第二,企业经营机制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出现了新的企业经营机制。例如,不少企业是在广泛推行了厂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革,明确企业产权关系,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又如由于实行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改进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责权利关系,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职工的收入同经济效益挂起钩来,开始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第三,企业管理基础工作有所加强。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包括标准化、计量、定额、信息、规章制度、基础教育、班组建设等内容。经过“六五”期间的企业整顿和“七五”时期的企业发展,各项管理基

础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加强。不少企业建立和健全了产品技术标准,有些大中型企业还制订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据国家技术监督局提供的材料,到1989年底,全国已制订国家标准1.6万多个,其中70%达到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部分已达到当代先进水平;此外,还制订了专业标准1.7万多个,地方标准13万多个。大中型企业很多建立和健全了劳动、物资、资金、费用等项定额,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职工岗位培训工作广泛开展起来,加强了基础教育工作。

第四,企业广泛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国外现代化管理的一些方法如全国质量管理、价值工程,已经在我国不少企业推广,并取得了显著效果。计算机应用越来越广泛,工业企业拥有的计算机已达到十几万台,大中型企业普遍应用了计算机辅助管理,北京、上海、江苏、辽宁等省市大中型企业计算机普及率已达90%以上,不少企业把计算机应用于生产控制、产品开发、企业管理等各个生产环节。

改革开放15年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虽然在生产、管理、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然而,由于国有企业积患较深,与国民经济改革的整体进程相比,与同处市场经济“赛场”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现状还不容乐观,令人担忧。具体表现在:

第一,效益低下。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差,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综合体现,据统计部门最近披露,同样投入100元资金,国有企业仅创造利润2.7元,而乡镇企业为7.2元;同样是100元固定资产,乡镇企业所创利税比国有企业高出1.12倍。与自己的过去比,国有企业1985年资金利润率是13.9%,1992年下降到2.7%;1985年利润总额是738亿元,1992年减至535亿元,呈逐年递减趋势。国有企业效益差,还突出地表现在亏损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预算内工业企业潜亏和明亏相加,已近1500亿元,其中

潜亏 900 亿元,亏损挂帐 400 亿元,福利基金赤字 200 亿元。在全部国有企业中,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潜亏,真正盈利的仅占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二,发展缓慢。统计数字表明,自 1980 年以来,国有企业的生产增长速度不但大大低于乡镇企业,而且已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民所有制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 1980 年的 76% 降至 1990 年的 54.6%,10 年间下降了 21.4%。与此相反,乡镇企业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工业总产值去年已突破万亿元大关而达 1.0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0%,而同期国有企业仅为 1.6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9%。按此发展趋势,“老乡”超过“老大”,只是时间问题。据国家经济信息中心预测,到 2000 年,国有经济的比重将由现在的 50% 左右降至 25%,即由“半壁江山”降到“四分天下有其一”。照此推算和预测,我们必须警醒,深化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

第三,负担沉重。国有企业负担重,主要表现在“两重一多”。首先是债务重。目前,预算内工业企业流动资金款和固定资产贷款余额已达 8000 多亿元,仅利息负担,每年数百亿元。国家计委企管司测算,如果按 1990 年的利润水平,国有企业即使将全部利润用于还贷,也需 18 年才能还清。

其次是税负重。从所得税看,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率为 55%,企业加上调节税达 70% 以上;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 8 级累进税,最低税率为 10% 最高为 55%;私营企业税率为 35%;中外合资企业税率为 33% 除了所得税,国有企业还要交流转税,以及各种收费,债券派销。中国工业经济协会的调查表明,国有企业纯收入的 81.6% 已通过税、利、费、券等形式上交各级政府,10.2% 用于归还专项贷款,企业实际盈利仅占 8.2%。

一多,则是冗员多。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约占职工总数 20% 左右,而退休人员又占 20% 左右。有些老企业,一个工人要养活一

个甚至一个以上退休工人。职工及家属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入学就业等种种沉重负担,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依然很严重。

第四,后劲不足。国有企业现有设备的技术水平,能够达到发达国家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水平的只占 12.9%,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只占 21.8%。许多企业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更新改造迫在眉睫,但却因缺乏资金而无力进行。例如在全国重工业基地辽宁省,623 户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经过系统改造的仅占 7.2%,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只占 18.3%。上海市纺织行业,95%以上的企业是解放前建厂的,12 万台专业主机设备中 50%以上是超龄服役,厂房有一半超过折旧年限,其中 14%已属危房。

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生产率变化的基本特征,从规范统计提供的常规指标看,国有企业效益指标在整个 80 年代基本是下降趋势,但在新的估算中,通过引入价格平减指数修正资本投入量,使生产率估算的经济学质量大大改观。从估算结果看,在整个 80 年代,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以 4.3%的速度上升。生产率上升的主要途径是,资源配置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部门和企业转移。生产率增长构成了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在 1983—1987 年期间,几乎有一半的工业产出增长是由生产率的增长引起的。

对不同要素的生产率和边际收益的估算结果表明,劳动边际生产率在 80 年代上升了 5.61%,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升了 4.97%,中间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则下降了 0.01%。从绝对水平看,中间投入的边际生产率为 101%,就是说,基本上等于成本,每投入一单位原材料,即可以获得相应的产出增长。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为 9.3%,就是说在大规模投资的 80 年代,由于投入效率低和使用不当,所以资本报酬率仅 10%。如果扣除了折旧率,资本报酬率会更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 2303 元/人·年,而 1987 年每一职工的年均收入加上补贴是 238 元/人·年。很显然,由于“隐劳动成本”

的存在,劳动力价格可能会远远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所以,在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投入是不经济的。

生产率除受行业影响外,也受地区分布、部门隶属关系影响。沿海地区的生产率高于内地,超出比例约为35%。隶属关系对生产率的影响,则表现在中央各部门直属大企业生产率最高,省一级政府主管企业显著低于平均水平,或许是由于省一级作为社会工程最主要的投资主体,许多参数处于落后状态。

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从现实情况分析,首先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可以说,这项改革是突破传统体制框架的先导,也是启动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的先导。扩大企业自主权伴之而来的是重新塑造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使国有企业行为基础,从传统的强制命令、行政依附机制,逐步转移到自主经营和利益激励机制上来。而且,自主权扩大,本身也同时包含着激励的含义,一方面是非货币激励,如计划权,另一方面是货币激励,如盈利权。权利的扩大,意味着企业自主活动空间的生长和延伸,为企业向市场主体的方向转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行为分析

十几年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走了一条“扩权让利”之路,也就是说,在不能扩所有权的前提下,不断地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把企业搞活。回顾这条“扩权让利”之路,诸如明扩暗不扩,先扩后又收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企业还是国家的,人们并没有增加对它的关心;而对放的权,让的利,却是变着法儿去抢去争。结果是,权一放,投资就猛增,出现一轮又一轮经济过热;利一让,效益就下降,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职工收入和奖金,即使亏损,宁可“挖”企业一块,也要先给职工发奖金。结果是,你要活起来吗?活起来就难免四处“跑冒滴漏”;你要管起来吗?又能找谁来对国家负责呢?

又如，企业承包。虽然比放权让利更明确，更前进了一步；但承包制毕竟是在承认现有产权制度前提下的一种“两权分离”。企业传统的产权关系并未改变，因而仍然未能提高经营者和劳动者对企业资产的关切度。原本那种想让承包者规规矩矩“交够国家的，留足企业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利益模式，因缺乏产权约束而在相当一部分企业中变成了“拼上国家的（设备）、断送企业的（后劲）、捞到自己的（收入）”这样一种短期行为。

再如，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厂长们反映，《条例》的确是企业改革以来最好的文件之一，但是，“蛋糕再好，摆在玻璃柜里，开柜的钥匙还在政府手里，吃不吃得成蛋糕，企业说话是算不得数的。”原因很简单，既然企业产权属于国家，则国家的代表——各级政府部门理应关心资产的保值和增殖，它们对企业的干预也就“天然合理”了。一位厂长曾坦率地说：“企业14项自主权，哪怕每一项都给了你，但关键的任免权捏在政府手里，你还是不得不俯首听命。现在是主管部门一手举着《条例》，一手拿着厂长乌纱帽，嘴里却要厂长抵制他们的侵公行为，这样的结果究竟如何，可想而知”。

换一个角度，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目标看，产权不能落实，“四自”难免落空。

——企业产权虚置，经营者不得不听命于产权代表者（政府部门），“自主经营”从何谈起？

——企业产权虚置，企业是国家的，职工统统由国家包下来，“自负盈亏”从何谈起？

——企业产权虚置，企业并非投资主体，即使有投资需求也常常是欲干不能，望洋兴叹，“自我发展”从何谈起？

——企业产权虚置，企业财产“人人有份，人人不管”，不挖白不挖，挖了也白挖，“自我约束”从何谈起？

显然，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不能动产权制度，那么种种改革

措施,不是难以奏效,就是扭曲变形。现阶段,改革过程中的企业双重行为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为目标:在多元化目标的基础上向职工目标的倾斜。改革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企业目标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每年仍向企业下达一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对这一部分生产任务,无论盈利与否,企业都必须完成。这样在企业的目标系统中就会保留着一部分传统体制追求产量、产值增长的目标偏好。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作用的增强与指令性计划生产任务的逐步减少,利润目标的导向作用日益强化。然而,在目前国有企业的职工仍处于既是所有者又是生产者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双重性身份的矛盾中,企业目标除受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影响以外,还要受到企业职工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点在国有企业的产权组织结构、职工决策参与方式,就业工资制度、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配套改革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就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明显。而现阶段企业职工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人均收入和福利最大化。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目标结构中,企业最终表现的目标在不同的内外部条件下很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总的来看,企业行为目标明显地向职工利益一方倾斜,离利润最大化的规范目标相差甚远。

第二,行为手段:多重手段运用中向市场化方向的逼近。在双重体制中,由于企业多重行为目标的存在,上述多种手段也可以长期共存于一个体制中。对部分企业经理问卷所作的分析表明,在确定承包目标,获取优惠原材料供应,获取银行贷款,争取投资立项时,企业优先采取的手段是保证完成利税指标,其后依次是创名优产品,改善经营管理、出口创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与政府讨价还价、保证完成指定性计划任务。如果说完成利税指标和改善经营管理既是计划机制也是市场机制均能接受的行为手段的话,那么,创名优产品和出口创汇则更多地与企业面向市场有关。这说明,随

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纳税和盈利开始成为企业重要目标的同时,企业经营者们开始更加倾向于使用与市场机制相关的行为手段去实现其行为目标。

第三,行为结果:一个耐人寻味的“怪圈”。企业的行为结果是其行为目标和行为手段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逐步渐进的,因此改革以来政府向企业放权同样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要想按部就班地推进这个过程,关键问题是让政府切实分享改革带来的利益。但实际上,自主权的扩大一方面提高了职工的货币收入、福利水平以及人均投资率,另一方面企业的人均利润和上交国家财政的收入却不能得到相应的增加。奖金虽具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积极作用,但它对企业劳动力的需求却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很显然,由自主权下放所产生的额外收益在企业收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分配上呈极端的不对称性。

为了更好更准确地分析在自主权——效率——自主权之间是否具有一个良性循环的激励系统,通过运用系统方程的分析办法表明,在企业的自主权变量(留利率)—劳动和资本激励变量——净产出和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向的作用关系。但净产出水平与留利率之间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负相关作用关系。由此断定,在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中存在着产出水平越高,留利率水平越低的现象。这种反向激励关系在1981—1986年期间表现得非常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由自主权扩大本身所引起的。并通过劳动激励变量和资本激励量所产生的那种对企业净产出和要素生产率均有正向激励的作用效果。

显然,通过分析自主权与利益分享,自主权与效率和效率与自主权之间的这种循环“怪圈”,我们不难发现,在自主权下放和变革企业行为机制的背后,掩盖着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存在的种种失衡。如扩大企业自主权与自主权使用规则和条件建设之间的不平衡,激励强化与约束软化之间的不平衡,效益挂钩与鞭打快牛

之间的不平衡,等等,或许正是这种不平衡使国有企业改革长期陷入了双重体制影响和制约之中徘徊。

第四,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行为关系调整。从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经验看,在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减少控制的数量方面,这或许是因为下放权力远比提高政府对企业控制的质量容易得多。而广泛地推行承包制,在最初阶段可以说是减少控制的改革走得最远的。如果说,指令性计划产值占企业总产值比重可以说明企业受控制程度的话,那么这种变化就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1980年指令性计划产值所占比例为86.10%,1989年则降低到62.46%。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经理厂长已经成为重要决策主体,象生产进度计划、产量品种计划等受经理厂长控制的程度,已经从改革初期的1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80%以上。从行业构看,受政府控制的程度不尽相同,在39个标准分类行为中控制最强的是采掘业和食品业,控制最弱的是轻工业和机电业。这种控制程度的差异,不仅仅反映在产出方面,也反映在包括原材料、劳动等投入品方面。

政府对国有企业控制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程度上,而且还表现在性质上,指令性计划已经失去以往靠政府权威和政治压力形成的“铁律”性质,讨价还价公开化,制度化。特别是在承包制以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变成了以盈利能力为管理控制中心的经济契约关系。于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新型特征,即二律相斥特征,一方面政府仍然凭借其政权与所有者的混合权力,强制企业接受与典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契约关系极不相同的承包指标;另一方面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会尽可能降低企业承包目标,所以在完成计划和降低承包指标之间有着某种替代关系,替代的办法是讨价还价,承包制中流行的讨价还价扰乱了市场平等的竞争条件,导致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失效。

在政府对国有企业控制弱化、软化的同时,企业与政府关系发

生的另一个变化是,国有企业凭借其政府的血缘关系,转而经营和开发政府。最主要的经营和开发形式是,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尽可能地推卸或减轻责任;在投资立项方面尽可能争取多的计划份额。然而,正如经济体制的双重性和企业行为的双重性一样,国有企业在职能上仍然有政府的延伸特征。其原因主要是实现就业目标,而企业之所以这样做,基本的基础是可以获得主管部门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资助。这说明已经走出政府怀抱的国有企业,在步入市场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与政府母体若即若离的联系。

第五,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偏好分析。引入市场机制,将企业推向市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市场的发展给国有企业带来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关照和保护”逐渐撤除,企业在投入品和产出品两方面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向市场,从样本调查情况看,整个 80 年代改革中,市场的影响在不稳定中扩大。但是,从目前的结果看,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是一种市场调节和计划干预的混合结构。这种混合型调控结构特点之一是,市场价格往往不能直接作用于企业,而是通过影响计划系统间接作用于企业。同时,由于计划控制对企业的调节,是一种包括产出、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在内的全方位调节,因而其对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结构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特点之二是,无论是在投入领域还是在产出领域,都存在着市场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表明,计划投入和计划产出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在解体,即便是政府指令性计划,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条件和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特点之三是,由于混合型外部结构存在,企业经济绩效往往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原因是受到政府控制程度差异的影响。如果用市场与计划价之比刻画企业市场供求结构的性质,如果企业在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计划控制程度也就相应提高,企业人均留利和奖金也会相应减少。所以,在目前的混合结构下,国有企业实际上不能充分利用改革引入的新型利益机制改善其绩效。

第三节 国有企业规模经济的现实状况

实现国有经济乃至国有企业持续、高速、健康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必须发展规模经济,这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之潮流,而且是我国经济成长壮大的重要举措。

一、规模经济是企业市场竞争的决定条件

企业的竞争在于市场,市场的竞争在于产品,产品质优价廉,在市场竞争中会处于主动地位,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企业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并不断取得发展。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是不可违逆的,企业只有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在市场竞争中才有前途,而规模经济正是有效途径之一。规模经济对于创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积累相当的经济、技术实力,才能通过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使产品具有竞争力。

当今世界经济已发展到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整个世界的经济趋于集团化、区域化、一体化的时代。各国的优秀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都不遗余力地追求强劲的竞争力,而发展规模经济越来越取得一致共识。企业发展的大型化、集团化、高效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例如,在美国,从1880年至1930年企业平均产出规模翻了一番。此后,由于大企业构成比重的提高,生产和资本集中化尤其是重工业集中化进一步强化。1937年,美国最大的50家钢铁公司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45%。二战后,随着两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新兴工业部门不断兴起,以微电子技术为龙头的新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使得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费用下降,投资规模扩大,企业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日本从五十年代开始,为了赶超欧美对钢铁和重、化工业采取“倾斜政策”,集中力量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使得规模经济获得充分发展。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得日本 1953 年到 1971 年的标准国民收入提高 28%。

二、我国国有企业规模不经济的严峻现实

我国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已成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一大障碍,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困难重重。由于企业规模不经济,我国国民经济在粗放式、低层次、低效益的轨道上蹒跚行进了几十年。

企业的规模是由规模经济决定的,任何一个企业在内外部条件的作用下,都有一个合理、经济的规模。达到这样的规模,生产费用就省,就下降,效益就提高;达不到这一规模,生产费用就高;超过这一规模,在一定范围内,生产费用呈递减趋势。因此,在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中,如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石油加工等,大企业和小企业的生产费用差别是非常大的。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小企业由于成本高、效益低,迟早要被市场淘汰,最终形成少数大企业分割市场的寡头型市场结构。在合理规模下生产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否则,就缺乏竞争力。我国企业成本高、效益低、竞争力差,规模不经济正是祸根之一。在我国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中,多数产业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最小合理规模以下生产的。小企业、小钢铁、小转炉、小轧机原料消耗高、能耗高、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根本谈不上规模经济性,不可能实现最佳的投入产出。

由于企业的规模不经济,产生了一些严重制约经济的后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阻碍稀缺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市场的力量,用看不见的

手,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向着合理、最优化的方向流动,从而达到最佳的投入和产出效果。这就驱动所有的资源和要素都向高效益、高产出的场所流动。在市场竞争非常完全的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正处于新旧体制相互转轨、替代、摩擦、冲撞时期,完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一下子就做到资源的合理化、最优配置是不可能的。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就是最大障碍之一。由于企业规模小,各种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高,浪费大,把十分紧缺本应流向更能发挥效益的地方的各种稀缺资源,大部分截流了。一方面,高效益、高产出的企业由于各种原材料短缺,吃不饱;另一方面,低效益、低产出的小规模生产力却在无限制地浪费资源。这就导致了资源利用率大大下降,加重了我国目前这种资源约束型经济的紧张程度,诱发投入要素和产出产品的价格轮番上涨。

第二,排斥新技术、新工艺,导致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异常迟缓。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增加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份额,必须加快实现企业的技术进步。如果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少,缺乏竞争力的小企业多,由于各小企业外部关联很弱,而内部自我循环却很强,存量资产不能及时快速进行调整,对新技术、新工艺有一种排斥拒外的效应,必然导致企业技术进步速度迟缓。

第三,小规模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导致投资膨胀。小企业大量涌现,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使人力、物力、财力分散,不仅导致投资效益低下,而且导致投资规模膨胀,基建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经济一过热,投资一膨胀,基础产业马上告急,能源、交通瓶颈立即掣肘,然后就得调整、治理,放慢速度,使国民经济随着投资的胀、缩,不规则、不稳定、盲目地向前发展。

第四,效益低、成本高,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差。由于企业规模过小,不可能实现大批量生产,难以实现生产过程标准化、专业化,